

全球智库半月谈

全球贸易增长缘何停滞

TFP 增长的顺周期性

中国影子银行的前因后果

从“四个全面”理解中国经济信号

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利比亚打击“伊斯兰国”所面临的三个挑战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贺 杨

胡霄汉

李笑然

谢晨月

伊林甸甸

张 麟

张舜栋

张文豪

朱子杰

朱子阳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侯书漪	科研助理
	伊林甸甸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石油价格和全球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 3

导读：油价下跌虽然会损害石油出口国，但会使石油进口国获利，而石油进口国的消费者又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而油价下跌会对全球经济表现“净促进作用”。事实并非如此，在零利率约束下，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导致实际利率的上升，从而抵消了油价下跌的正面收入效应。这要求各国在实施结构性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要加强对经济需求的刺激。

全球贸易增长缘何停滞？ 5

导读：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和 FDI 增长缓慢，表现低迷。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后，贸易自由化受阻、全球微观保护主义抬头。虽然贸易和投资仍有潜力，但作者仍对短期持悲观态度。

油价和 GDP 的关联消失了吗？ 12

导读：最近两年来，世界油价经历了明显的下跌过程。油价下跌究竟由何引起？其背后的机制又是否随时间变化？油价下跌对于欧盟 GDP 的影响是怎样的？本文讨论了这些问题。

全球治理

2016 年：让 G20 更有效——基于中国和英国视角的分析 15

导读：2016 年，中国即将主办 G20 峰会。中国将如何把握这次契机，将 G20 峰会塑造成更具效力和影响力的机制？来自中英两国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

TFP 增长的顺周期性 17

导读：过去几周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是否存在顺周期性的问题引起了诸多讨论，本文总结了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并且总结于文章当中。

TPP 六大短板与中国应对 20

导读：2015 年 5 月，历时五年多的 TPP 谈判宣告结束并达成协定文本。本文从谈判、审批和实施等方面，分析了 TPP 的六大短板，以及为中国如何做出科学应对提出了建议。

经济政策

中国影子银行的前因后果 24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影子银行在中国的兴起有助于稳定中国的产出增长。本文关注中国影子银行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委托贷款。在危机过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期，

委托贷款获得了迅速发展，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部分的影子贷款通过非国有银行流入高风险行业。如果缺乏适当的管制，这样的金融扭曲将最终阻碍由投资导向型增长向平衡增长的转型。

中美贸易不为人知的事实 31

导读：本最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相关讨论甚嚣尘上。然而，这些保护主义言论是否站得住脚？主张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家又忽略了哪些问题？本文对一篇保护主义评论进行了批评。

聚焦中国

从“四个全面”理解中国经济信号 34

导读：习总书记上台以来，以“四个全面”为代表的政治口号也吸引了西方观察者的注意。如何理解这些口号的经济内涵？其中又包含有哪些政策推论？本文讨论了这些问题。

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 36

导读：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的代表性战略规划。其在实施的过程，尤其是操作层面，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风险，但一旦成功，将会成为未来十年很重要的力量。

战略观察

让中国赢，对美国有好处 38

导读：2016年1月15日美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发表文章《让中国赢，对美国有好处》，作者对美国在亚投行成立后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与批评，呼吁白宫冷静对待中国的崛起，分清主次缓急。

在利比亚打击“伊斯兰国”所面临的三个挑战 41

导读：西方国家准备打击正在利比亚不断扩张势力的“伊斯兰国”。本文作者指出了“伊斯兰国”扩张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同时点明了西方国家对利比亚采取干涉行动面临的困难。

中国：维持在南海的吸引力 43

导读：蔡英文赢得台湾大选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过去八年稳定的两岸关系使得一度停滞的南海领土争端愈发激烈。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和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重点区域，面对当前的新情况，中国将会审慎的处理南海的领土争端，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但是中国对核心利益的述求不会改变。

本期智库介绍 45

石油价格和全球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

Maurice Obstfeld,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和 Rabah Arezki,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油价下跌虽然会损害石油出口国，但会使石油进口国获利，而石油进口国的消费者又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而油价下跌会对全球经济表现“净促进作用”。事实并非如此，在零利率约束下，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导致实际利率的上升，从而抵消了油价下跌的正面收入效应。这要求各国在实施结构性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要加强对经济需求的刺激。编译如下：

一年半多以来，石油价格一直持续处于低位，但这并没有成为全球经济的“强心剂”。我们倾向于认为，价格略微反弹和发达经济体摆脱低利率环境的困扰之后，低油价才能促进全球经济。

2014年6月以来，油价下跌了65%（按美元计算约为70美元），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逐步放缓。传统上我们认为，油价下跌虽然会损害石油出口国，利好进口国，但石油进口国的消费者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而油价下跌会对全球经济表现出“净促进作用”，但股票市场不支持这一理论。过去6个多月里，当油价下跌时，股票市场也在下跌。

油价与全球经济增长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我们认为这次与之前不同的，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当前面临着零或者接近零的名义利率。

供给和需求

世界范围油价的下跌要么因为全球供给增加，要么因为全球需求下降。当前，油价下跌，全球增长放缓。虽然，油价下跌有助于放缓全球增长放慢的步伐，但不会改变这一趋势。

就供给端而言，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历史高产出，现在包括伊朗以及一些非OPEC国家的出口，导致石油供应一直保持强劲。此外，面对油价走低，美国页岩油供应也在增加。美国虽是石油进口国，但低油价并没有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研究表明，近期油价下跌的原因中仅有部分是需求放缓，占比大概在1/2到1/3之间，剩下的原因是供应增加。

低油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好处到底体现在哪里？2016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认为全球需求下调的最大因素来自石油出口国，尽管其占全球GDP的比例（约12%）相当小。但在油价下跌幅度比预期更大的背景下，石油进口国的国内需求也并没有那么好。下面我们仔细研究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的需求构成。

石油出口国的国内需求

去年石油出口国的消费疲软，投资乏力。富有的石油出口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储备或主权财富基金（大多数国家有）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他们也一直在大幅缩减政府开支。大多数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显著缩小或逆差显著扩大，主权债利差上升。有时受汇率大幅贬值的影响，进口商品变得更加昂贵。当然，与油价无关的因素也对一些石油出口国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比如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国内冲突以及俄罗斯的制裁。

石油进口国的国内需求

事实上，油价下跌对进口石油的发达经济体（比如欧元区）的消费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影响程度没有达到预期。新兴和发展中的石油进口国的情况各异，因为他们面临着国际油价对本国燃料价格传导机制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减少了燃料补贴。总体上而言，石油进口国的国内需求上升，基本符合预期。

处于零利率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关系令人意外

在本轮油价下跌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缓慢，这导致中央银行无法进一步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零利率约束下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油价的下跌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就业增加以及通胀率的降低。为了抑制通胀的下降，防止经济陷入通缩，央行应该降低利率刺激需求。但当经济面临零利率约束时，央行无法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因此实际利率上升，这会抑制需求，从而抑制产出和就业的增长。当前，很多经济体面临这一困境。当石油进口国的宏观经济条件显示中央银行实行极低利率的做法合理时，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化抵消正面收入效应。

下一步行动

油价长期处于低位会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变得更加复杂，通胀预期的“脱轨”也会增加风险。当前的低油价可能会导致公司和主权债违约的各种“错位”，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这要求各国在实施结构性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要加强对经济需求的刺激。

本文原题为“Oil Pric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t’s Complicated”。本文作者 Maurice

Obstfeld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Rabah Arezk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大宗商品研究主管。

本文于 2016 年 3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贸易增长缘何停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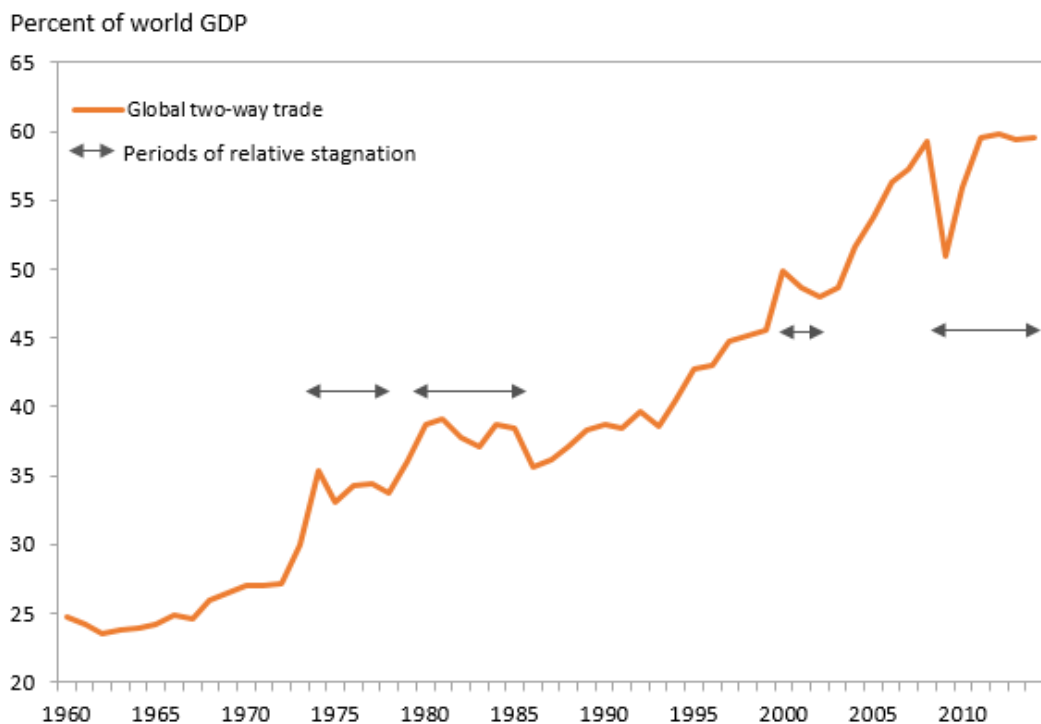
Gary Clyde Hufbauer&Euijin Jung /文 朱子阳/编译

导读：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和 FDI 增长缓慢，表现低迷。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后，贸易自由化受阻、全球微观保护主义抬头。虽然贸易和投资仍有潜力，但作者仍对短期持悲观态度。编译如下：

战后的 60 年时间中，前所未有的贸易增长和 FDI 扩张成为了人类社会最大的两个推动力量。其中，1980-2005 年的贸易年均增长为 6%，而 FDI 年均均为 15%。表 1 至 4 展示了以现价美元计算的贸易量、FDI 和贸易、FDI 占全世界 GDP 比重，贸易和 FDI 每年推动世界 GDP 增长近 4%，使得全世界十亿多人脱离贫困，使得发达国家的千万人过着舒适的现代生活。

但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和 FDI 出现了大幅萎缩，出现了类似于 1974-1978 年、1980-1986 年、2000-2004 年的贸易下滑。而且从金融危机至今已经 7 年，成为了战后以来持续最长时间的贸易下滑。

表 1：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1960-2014（占 GDP 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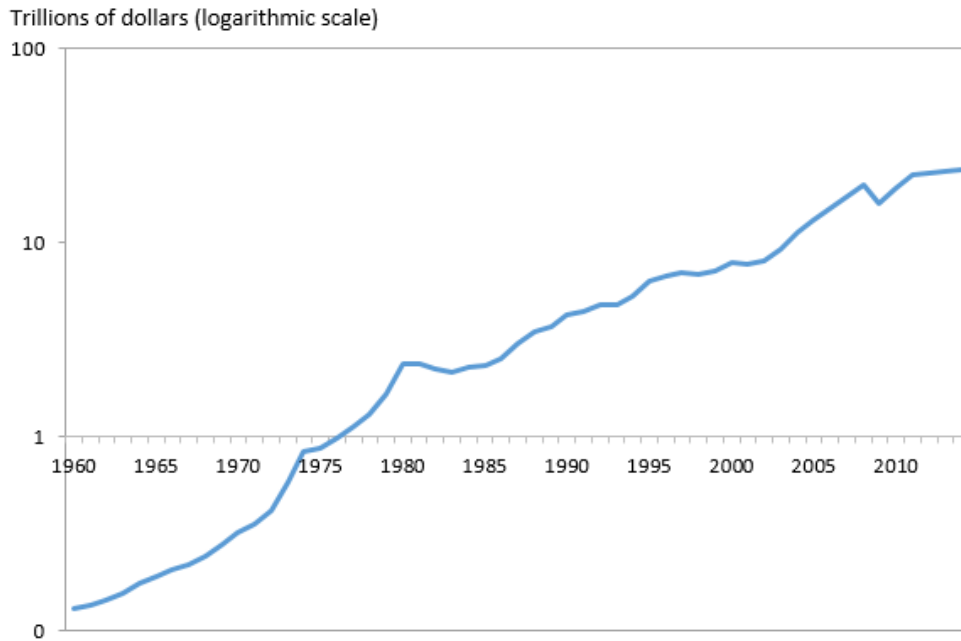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自 2008 年以来，贸易占 GDP 比重一直处于 60% 以下。虽然 2010 年经历了短暂复苏，但年均增长仅为 3%，几乎与 GDP 保持同步（图 2）。而 FDI 存量也

出现类似情况，但是新增 FDI 已经出现了巨大倒退，从 2007 年顶峰 1.9 万亿美元降为 1.2 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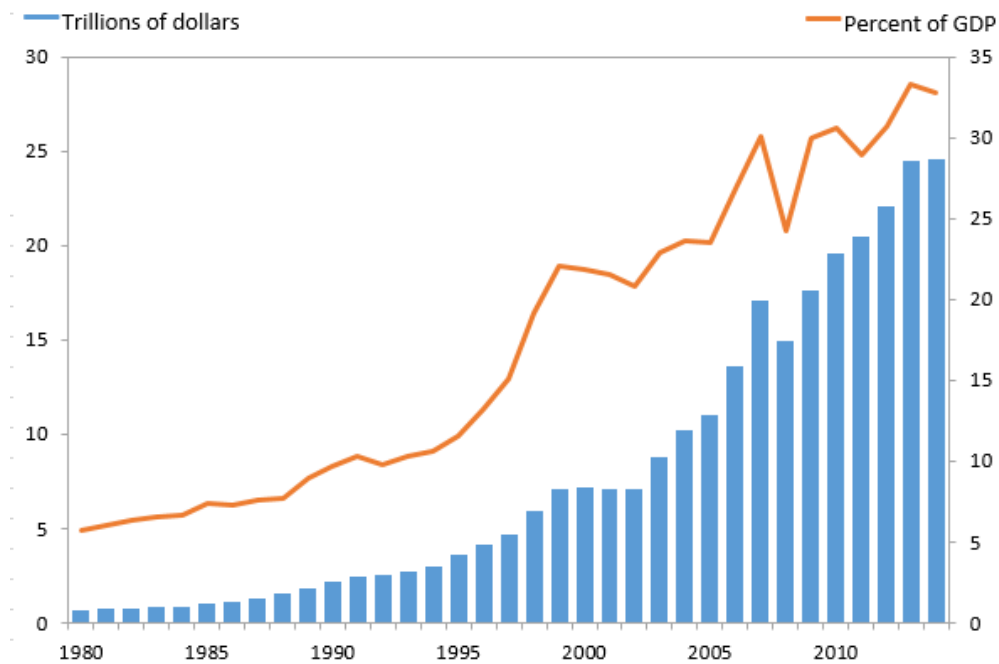
图 2：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1960-2014 (总量)



注：除去统计误差，全球出口与全球进口数据上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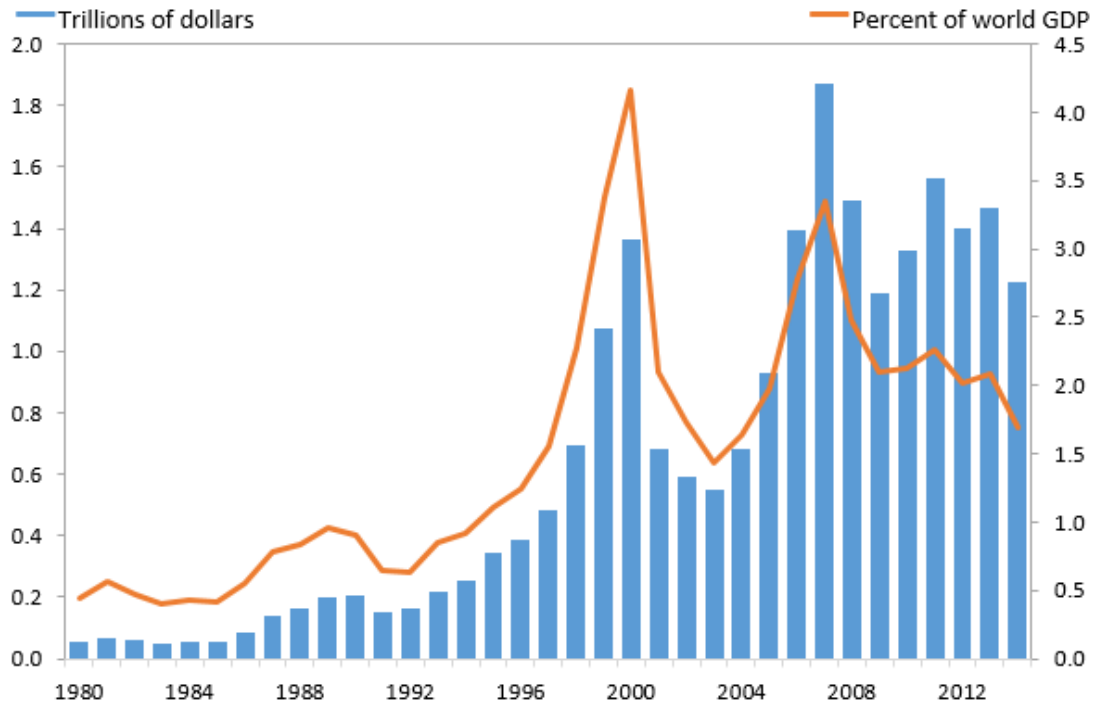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表 3：全球 FDI 存量，1980-2014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表 4: 全球 FDI 流动: 1980-2014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

自由化倒退和微观保护主义

早在 20 年前的 1994 年, 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谈判中, 贸易自由化就遭遇了巨大挫折。自 1947 年关税总协定 (GATT), 多边贸易谈判中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在多伦多回合和乌拉圭回合之间, 竟隔了近 15 年。而自乌拉圭回合, 21 年已经过去, 而多哈回合的结束还遥遥无期。2005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削减贸易障碍总算为一定程度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画上句号。

表 1: GATT 和 WTO 谈判历史

Year	Round	Subjects covered	Countries engaged	Years since prior Round concluded
1947	Geneva	Tariffs	23	-
1949	Annecy	Tariffs	13	2

1951	Torquay	Tariffs	38	2
1956	Geneva	Tariffs	26	5
1960-61	Dillon Round	Tariffs	26	5
1964-67	Kennedy Round	Tariffs and antidumping measures	62	6
1973-79	Tokyo Round	Tariffs, nontariff measures, "framework" agreement	102	12
1986-94	Uruguay Round	Tariffs, nontariff measures, rules, servi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 settlement, textiles, agriculture, creation of WTO	123	15
2001-present	Doha Round	Tariffs, nontariff measures,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rules, servi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vironment, trade facilit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ecommerce	162	21

GATT =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WTO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ource: [WTO](#).

自关贸总协定诞生以来，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使得贸易自由化爆发出强大力量。然而始于 2001 年的多哈回合却拖延至今。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拒绝削减其对农产品限制以及非农产品市场开放。这些国家坚持农业补贴、关税和配额。如果这些领域实现自由化，全球贸易将每年增长 1000 亿美元。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寻求其他解决方式。

在乌拉圭回合后，中国于 2001 年加入 WTO，削减了关税和其他壁垒。因此其出口在世界份额由 2000 年 3.4% 增长至 2010 年 9.1%。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桌上拒绝进一步削减关税。因此，奥巴马开始寻求与韩国、哥伦比亚等单独建立自贸区，其他国家也纷纷建立自贸区。但是自贸区作用有限，尤其在服务贸易上。

在 08 年金融危机后，微观保护开始抬头并游走于 WTO 条款之外。这一现象表现为对保护工作和国内企业的政治承诺，例如美国的购买国货、全球范围内对盗版行为的严查。表 2 列出了 117 的地方规章，涉及 9280 亿美元的贸易，并可能使得全球贸易损失 930 亿美元。

表 2：自 2008 年以来受保护措施而影响的贸易额

Table 2 Estimated goods and services trade affected by LCR measures since 2008		
LCR measure	Estimated affected goods and services trade (billions of dollars)	Speculated estimate of trade reduced (billions of dollars)
47 quantifiable measures	373	37
70 nonquantifiable measures	555	56
117 total LCR measures	928	93

LCR =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s
 Source: Hufbauer et al. (2013).

地方规章（LCR）是金融危机后贸易限制的一种形式。Simon 主持的一项研究表示，自 2008 年以来，全世界新增了 3500 多项保护措施，许多由 G20 国家实施。其中，最为严重的三国是俄罗斯（65 项）、印度（55 项）、美国（51 项）。这些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公共采购中歧视外国公司、出口税和配额、贸易补贴。这有可能保护了部分企业利益，却宏观上损害了经济。这些措施甚至抵消了削减关税带来的效果。

潜在的贸易扩张

与一些观察家不同，我们认为贸易增长还有一些潜力。制造品关税还有 6.8% 待削减，低效的物流系统有待提高(可以带来运费下降 13%-18%)。WTO(2015) 通过引力模型和 CGE 模型加以分析，引力模型显示世界贸易可以达到 1.1 万亿

-3.6 万亿美元。而 CGE 模型则显示，世界贸易还可以多增长 2-3 个百分点，而世界 GDP 将因此增长 0.3-0.5 个百分点。

表 3: TFA 的贸易和 GDP 影响预估

Table 3 Estimated trade and GDP impacts of TFA implementation			
		Units	Range of values
Gravity model			
Exports of goods	Billion of current US dollars		1,133 3,565
	Percent change		9.1 28.7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Exports of goods	Billion of current US dollars		750 1,045
	Addition to 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growth, 2015-30		2.1 2.7
GDP	Billion of current US dollars		346 555
	Addition to 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growth, 2015-30		0.34 0.54

TFA =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Source: WTO, 2015, *World Trade Report 2015: Speeding up trad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the WTO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展望

目前，增长率仍较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收入放缓、世界经济低迷，似乎使人怀疑起自由化。一方面，在美国大选竞选中，Trump 和 Sanders 大力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另一方面，大洋彼岸的欧洲却反对 TTIP。除了政客观点，中产阶级选民也值得关注。2015 年，对 TTP 的支持者总算超过了反对的民众。而在欧洲，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对 TTIP 表示支持。然而，反对者的声音总是很大，在未来五年，他们是否可能会阻碍 TPP 和 TTIP 呢？在发展中国家，小国支持自

由化，大国（例如中国、印度等）却反应冷淡。因此，即便各国央行和财长不可思议地达成协议，要使贸易增长 6%、FDI 增长 2 万亿仍然是不现实的。

本文原题为“Why Has Trade Stopped Growing? Not Much Liberalization and Lots of Micro-Protection”。本文作者 Gary Clyde Hufbauer&Euijin Jung 为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4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油价和 GDP 的关联消失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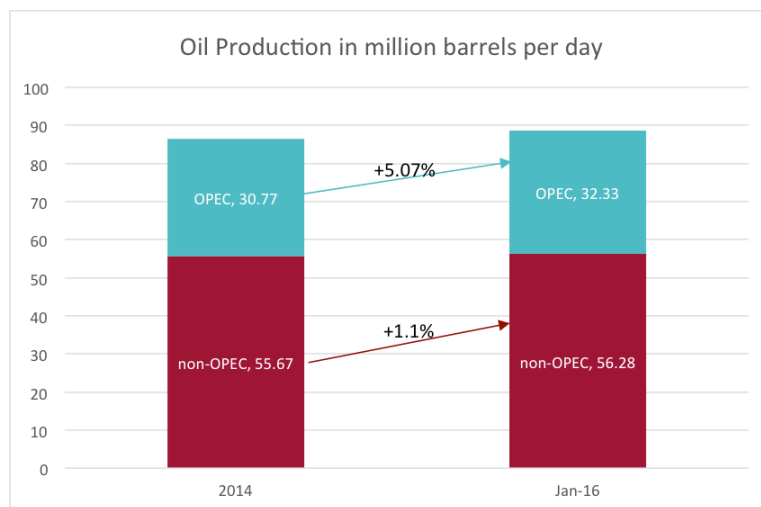
Domenico Favoino 和 Georg Zachmann /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最近两年来，世界油价经历了明显的下跌过程。油价下跌究竟由何引起？其背后的机制又是否随时间变化？油价下跌对于欧盟 GDP 的影响是怎样的？本文讨论了这些问题。编译如下：

截至 2016 年 2 月，全球油价已经跌至约 30 美元/桶，而在 2014 年，这一数字是 100 美元/桶。从油价的供求平衡来看，这一巨变可能有三大原因：供给变化、需求变化或预期变化。

2015 年，由于美国的供给出人意料地提高，以及伊朗等国重回国际市场这两个因素，全球石油供给继续上升。此外，欧佩克组织也没有进行任何减产的阻挠。于是，在 2015 年底时，全球石油产量比去年同比提高 3% 左右，日均产量从 8600 万桶提高到 8850 万桶。国际能源组织当时预测，如此一来不久后世界将会充斥着石油。日益增长的供给为油价提供了下行压力。

图 1 2014 与 2016 年 1 月石油产量变化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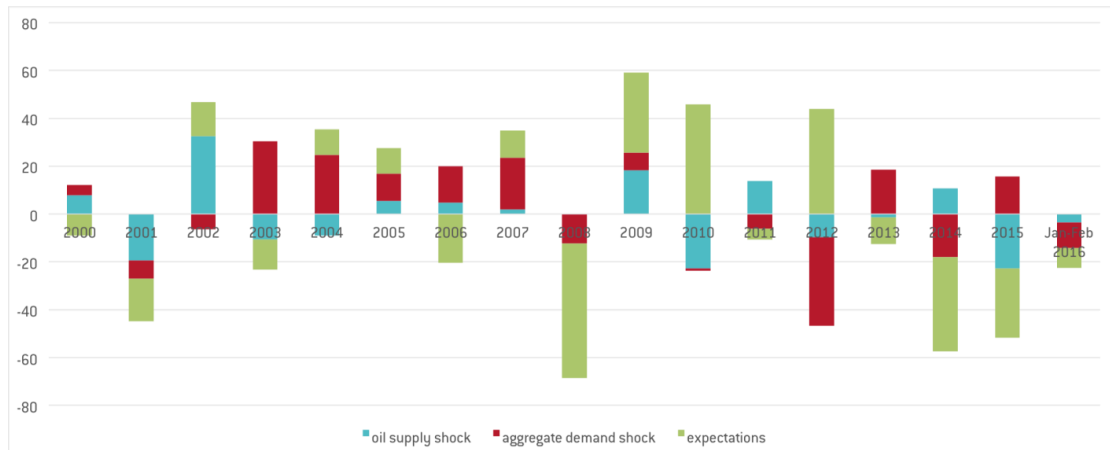
注：数据来自 OPEC 统计数据。

而当前全球的总需求则相当萧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放缓，而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风险依然存在。这一切都减弱了对石油的需求，并且对油价进一步造成下行压力。

当然，油价不能仅仅从供求角度得以解释，还可以从对未来的预期因素得以解释。低油价对欧盟经济的冲击会有多大，取决于其经济对这三个因素的相对依

赖程度。我们发现，过去三年的油价下跌中有 12% 可以被总需求因素解释，15% 可以被供给增加所解释，而 73% 都可以被供求关系的预期因素解释。我们这一发现的理论基于 Kilian (2009) 的论文，通过构建一个结构化 VAR 模型，我们将油价波动分解为三大因素，并且对应进行分析。本质上讲，我们相当于将 Kilian 的模型加以改进并应用于了欧盟经济的分析当中。

图 2 2000 至 2016 年间石油的价格冲击



注：数据来自本文计算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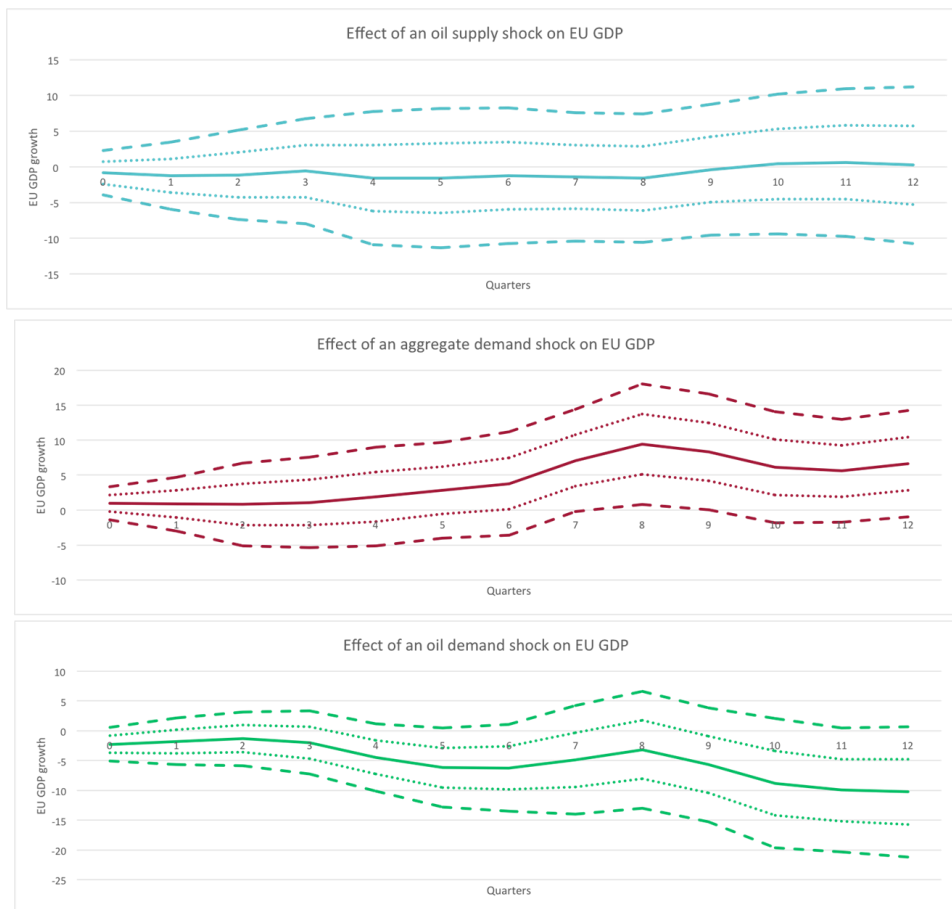
那么，这对于欧盟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呢？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三大因素对经济表现有着结构性不同的冲击效果：（如图所示）

在未来三年中，供给冲击对欧盟 GDP 没有显著冲击。因此，2015/16 年间提升的原油供给并不会推高 GDP；

历经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滞后，更高的总需求将会促进 GDP 提高。因此，2014 和 2016 年内降低的总需求也会对 GDP 形成下行压力，尽管 2015 年石油需求有所上升，但总的效果依然会是下行的；

最后，导致油价下行的预期因素曾经对 GDP 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来看，我们观察到的主要由预期因素驱动的油价下跌，对欧盟经济来说或许将会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图 3 油价变化对欧盟 GDP 增长的影响



注：数据来自本文计算结果。

这一因素分解分析最令人惊讶的结论是，预期的作用自 2008 年以来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我们的分析显示，08 年以前油价的决定因素组合与 08 年之后的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预期因素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一发现，与全球石油市场愈发与供求关系脱节的假说是一致的。（这可能是由失败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

总结来看，油价的下跌对欧盟经济而言可能有较为正面的作用。然而，这一预测也意味着我们默认过去石油供给、需求和 GDP 的三元关系依然成立。但事实上，预期因素愈发重要的地位令我们不禁怀疑这一关系是否仍然成立。因此，油价下降对 GDP 的真正作用依然有待观察，当然，这一作用也可能最终表现的令人失望。

本文原题为“Is the oil price-GDP link broken?”。本文作者 Domenico Favoino 和 Georg Zachmann 为 Bruegel 中心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16年：让G20更有效——基于中国和英国视角的分析

Stephen Pickford 和 ZhaXiaogang /文 朱子杰/编译

导读：2016年，中国即将主办G20峰会。中国将如何把握这次契机，将G20峰会塑造成更具效力和影响力的机制？来自中英两国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编译如下：

图1 出席G20峰会的领导人刻像



尽管完全掌握2016年G20峰会议程的主动权还颇有挑战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让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办国地位确保G20关注最重要的议题，履行G20国家承诺，并且解决当下的全球性挑战。本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 中国主办G20峰会的这一年，是全球经济面对显著挑战，经济增长继续放缓，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陷入衰退的一年，也是制造业部门困难重重，下行压力明显的一年。
- 对于解决全球性挑战与重大问题，G20是一个可以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机制。因此，中国作为本届峰会举办国，对于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肩负有重大的责任。显然，中国的经济体量，发展经验，外汇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都将有助于中国高效地行使这一角色。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峰会中的优先议题将是：发挥经济增长潜力，改进全球治理，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并且落实联合国2030年发展目标。
- 为了促使G20峰会明确具体的行动方向，中国应该重点关注三大主要领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支持可持续发展，并推进全球分配平等。

- 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G20 国家需要采取行动，切实落实布里斯班峰会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不仅于此，它们还需要携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化结构性改革，以更深远地推进这些行动。它们还需要复兴过去的贸易协定，支持国际贸易组织，尤其是 WTO。此外，多边发展银行需要更多地关注支持发展。
- G20 国家同时对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也肩负重要职责，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是两大关键要素。
- 在缩小贫富国家差距的同时，G20 国家也可以在诸多方面推动全球平等：更广泛的国际税务合作及反腐败举措；加强国际安全网络和机制，从而支持陷入危机的国家；改进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模式。未来，G20 国家也需要进一步推动 IMF 的机构改革，从而令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
- 同时，G20 国家也需要及时反省其机制本身的定位和结构，从而令这一机制更加高效，并确保这将促使全球治理更加广泛的改革。
- 当然，这将是一份庞大而富有挑战的议程，但外界对中国的地位富有高度期待，认为中国能够并且将会利用其举办国地位确保 G20 国家行动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向世界证明，G20 依然是国际经济合作领域最顶尖的论坛机制。

本文原题为“Towards a More Effective G20 in 2016: Chinese and UK Perspectives”。本文作者 Stephen Pickford 和 ZhaXiaogang 分别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3 月刊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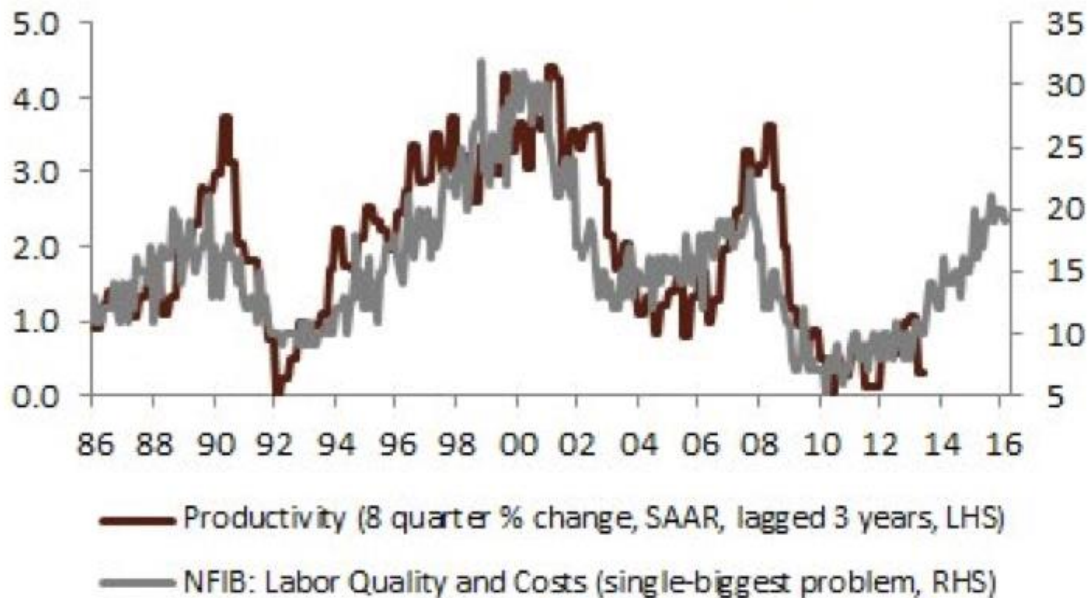
TFP 增长的顺周期性

Jérémie Cohen-Setton / 文 张文豪 / 编译

导读：过去几周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是否存在顺周期性的问题引起了诸多讨论，本文总结了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并且总结于文章当中。编译如下：

Alexander Field 写到，在 1890-2004 年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具有非常强的周期性。近一个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与经济周期系统地吻合，而其对应的弹性在二战前后的多年里，相对于失业率而言又是显著的稳定。每年失业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即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上升 0.9 个百分点。而在 20 世纪当中最严重的三次产出下滑时段：1929-1933, 1974-1975, 1979-1982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都经历了下滑。

图 1 生产率增速与劳动成本变化关系示意图



注：本图引自上文所述的论文。

J.W. Mason 写到，尽管主流经济学界普遍认同滞后性的重要性，却少有人讨论“反滞后性”——通胀在长期上对总需求的积极效果——的重要性。但作者认为在潜在需求增长的时期，技术创新、投资和劳动力不成比例的扩大是很容易理解的。在任何一个例子里，传统意义上的供求关系都被倒置了。在反滞后性重要的世界里，过度需求可能仅仅导致暂时的高通胀，但缺少永久的高就业和高产出。

Gerald Friedman 评价到，我的研究中对桑德斯和罗默经济政策的评价差异反应了统计与动态模型的区别，在前者当中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是大体固定的，

而后者当中这些因素都随着需求而变动。如果我们都赞同萧条可以引起生产率的下降，为什么我们不认为繁荣会通过促进设备的投资，以及激励工人提高效率从而赚取超额工资来提升生产率呢？这一模型与许多包括凯恩斯、卡尔多和熊彼特在内的经济学大家的思路都是一致的。

Evan Soltas 则认为，尽管有周期关系的存在，但政策制定者们并不一定能通过减小产能过剩来永久性地增加生产率。生产率增长与产能过剩有相关关系。事实上，不仅是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也表现出了这种关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减小产能过剩就能够永久地提高长期的生产率增速呢？答案是未必。以下是一个反例。试想一个公司有两种活动：生产与保养维修，二者都需要劳动力。当生产的边际利润更低时，例如在衰退时，公司就可能推迟维护从而投入更多劳动进行生产。但现实生活中，没有企业可以永久地推迟保养维修。

Alexander Field 在文章中表示，由于大萧条在公众和学界中的刻板印象，很少有人会相信 1929-1941 年间是美国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然而，Gerben Bakker, Nicholas Crafts 和 Pieter Woltjer 使用更为精确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估计方法并且发现，尽管 1930 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是非常迅速地，但也不如 1948-1960 和 1960-1973 两个时间段的进步更快。

Alexander Field 在文章中写到，有证据表明产业和组织正如个人一样，在逆境中会焕发出积累创新和创变能力的动力，这在长期来看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基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技术成熟到可以投入实践运用的程度，就会有人不断地开发下去，无论大环境是否萧条。

Gerben Bakker, Nicholas Crafts 和 Pieter Woltjer 认为，与其说 1930 年代的技术进步是大萧条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克服了大萧条的逆境所达成的成就。30 年代的技术进步反映了美国独步天下的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资和市场经济，这是强大的全国性创新体系的基石，也造就了技术进步的骄人成绩。

图 2 1929 至 1947 年间美国非农产业增速变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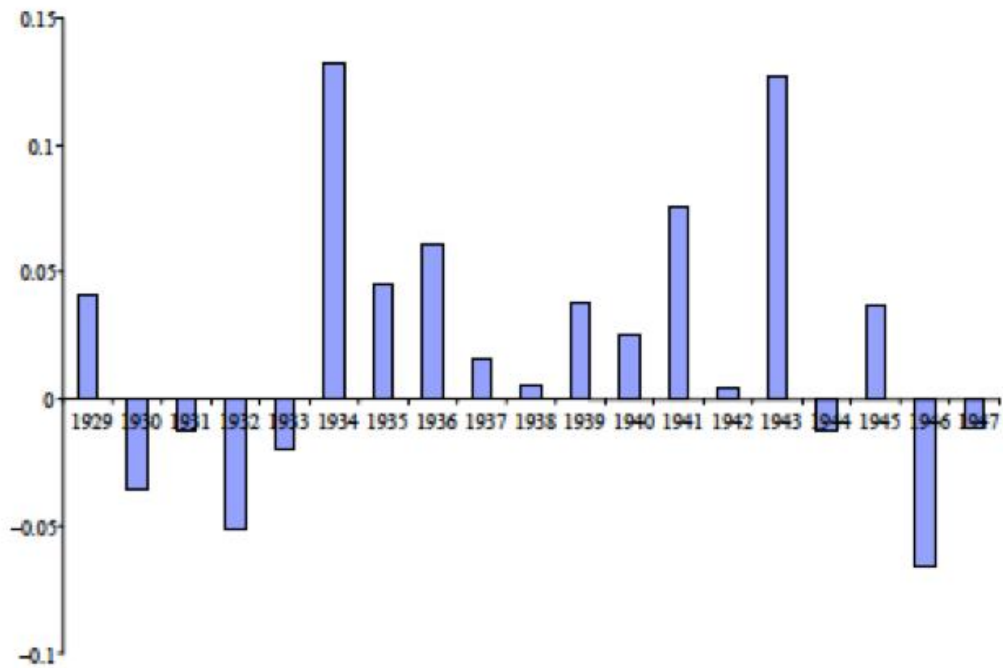


FIGURE 1
TFP GROWTH RATES, UNITED STATES, PRIVATE NONFARM ECONOMY, 1929–1947

注：本图引自上文所述的论文。

Matthew D. Shapiro 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周期性当中大部分相对显著的部分，都是由资本的每周工时的变动引起的。正如预期所料，资本的周工时是顺周期的。在低谷的 1982 年，资本的每周工时要比平均值低 5.3 小时，而在高峰的 1988 年，则要高 5.2 个小时。

本文原题为“The procyclicality of TFP growth”。本文作者 Jérémie Cohen-Setton 为 Bruegel 中心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TPP 六大短板与中国应对

徐秀军 /文

导读：2015年5月，历时五年多的 TPP 谈判宣告结束并达成协定文本。本文从谈判、审批和实施等方面，分析了 TPP 的六大短板，以及为中国如何做出科学应对提出了建议。编译如下：

自 2010 年 3 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启动首轮谈判以来，谈判各方分歧一直难以弥合，预定达成协定的时间一拖再拖。2015 年 10 月 5 日，历时五年多的 TPP 谈判终于在相互妥协中宣告结束，并达成协定文本。但时至今日，TPP 仍饱受包括谈判成员在内的世界各国民众的质疑和争议。究其原因，主要缘于 TPP 存在制约谈判、审批和实施的六大短板。在中国，TPP 的负面效应和潜在威胁一直是官、商、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作为被排除在这一协定之外的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应充分认识 TPP 的固有问题，理性应对这一协定实施后可能带来的冲击。

六大短板

战略考虑各不相同。对于美国而言，主导并大力推动 TPP 谈判，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作为“重返亚太”、应对亚洲新兴力量崛起、布局亚太秩序的重要手段；二是通过 TPP 主导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国际贸易规则。对于日本和加拿大等国言，则主要基于维系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并借此提升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而对于越南等东南亚小国而言，加强同美国等经济大国的关系，难掩谋求平衡区域大国关系的意图。作为一项经贸协定，TPP 承载了多种战略目标与诉求，使得各成员不得不努力寻求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平衡点，大大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预期收益出现分化。由于贸易与投资转移效应，TPP 的签订实施将给各成员的实际 GDP、福利、进出口等方面带来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各成员的预期收益却存在很大差异。根据测算，TPP 将导致新加坡包括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在内的福利增加 1598 亿美元，而智利和秘鲁的福利增加不足 10 亿美元，分别为 9.9 和 5.9 亿美元；导致越南和新西兰的出口增加 6.6%和 4.6%，而墨西哥仅为 0.9%。尽管 TPP 能使多数成员的贸易条件不同程度改善，却会导致马来西亚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一旦 TPP 实施，由于各成员收益存在明显差异，很可能成为贸易纷争的隐患。

国内团体得失不均。在谈判阶段，TPP 之所以久拖不决，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受到来自各成员内部利益集团的压力。尽管高标准的开放政策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但给各成员国不同产业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甚至截然不同。例如，美国的汽车行业、日本的医疗和农业、新西兰的乳业、越南的服务业等都将遭受不同程度地冲击。TPP 给国内不同团体带来的得失不均加大各行业之间的利益分化，也激发了国内受损团体的反抗情绪，并由此形成阻碍 TPP 审批和实施的主要力量。

主权治权存在冲突。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相比，TPP 确立了具有更强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TPP 要求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例如确立保护投资者权利的投资者诉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M），高于 WTO 的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标准以及包含了劳工与环境条款争端解决的具体措施。这些规则涉及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很多领域，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完全超越主权界限，并且需要当事国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如触及核心利益，很可能导致主权与治权之间的冲突，从而影响 TPP 规则的权威性。

排他性的规则体系。自谈判伊始，TPP 的排他性一直为外界所诟病。TPP 的排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员的选择性。作为一个区域性经贸协定，TPP 并非向亚太区域所有成员开放，而是通过邀请和“一致同意”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会员俱乐部，割裂了原来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二是规则的歧视性。例如，原产地规则方面，TPP 对于纺织品及成衣实行“从纱开始”（yarn forward）原则，要求成衣产品使用的纱线与布料等所有原物料必须产自成员国，且剪裁与缝合等制作过程皆须于成员国内进行，才能享受关税减免。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成员利益，但这种狭隘的规则不利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冲击多边经贸进程。TPP 对全球多边经贸体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TPP 加剧了全球经贸格局的碎片化。为了应对 TPP 带来的冲击，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谋划新的区域经贸谈判，从而启动竞争性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由此导致全球经贸格局朝着碎片化的方向加速发展。二是弱化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动力。TPP 的实施生效，首先将降低其受益成员推进 WTO 框架下多边谈判的动力并使多边进程阻碍加大，进而损伤其他国家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全球多边进程受阻，TPP 成员的利益也将受损。

中国应对

尽管 TPP 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潜在威胁难以消除，但鉴于 TPP 存在的诸多短板以及由此导致协定审批面临的各种考验，TPP 的冲击往往被过度夸

大。无论 TPP 能否顺利实施，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对于中国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和冲击，开创对外经贸新局面都不无裨益。

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实现标准升级和规则对接。客观来看，TPP 协定在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等方面的部分规则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趋势，值得研究、借鉴和学习。在此过程中，通过标准升级和规则对接倒逼国内改革，加快国内相关政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既直接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也为适应更高标准的规则奠定基础。

搞好四大自贸试验区建设，打造对外开放新窗口。目前，中国已批准建立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发达区域先行先试 TPP 规则、积极应对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挑战以及积累风险防范经验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新的窗口。12 月 1 日起，四个自贸试验区将先行试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在适应新规则上迈开了实质性步伐。

加速双边和区域经贸谈判，化解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说，TPP 既有利于美国主导亚太合作进程并削弱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又会因其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导致中国经济利益的损害。为此，中国应加速推进包括 TPP 成员在内的主要区域和全球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经贸谈判，尤其是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加强同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

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争取更多实质性成果。与 TPP 不同，“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广泛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沿线各国之间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边和多边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既有利于提升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合作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积极参与多边经贸协定谈判。目前，WTO 拥有 160 多个成员，WTO 框架下的国际贸易协定构成国际贸易领域的唯一体系。尽管 WTO 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但 WTO 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拥有不可挑战的地位和作用，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是任何区域贸易安排都无法替代的。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中国既是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创造者。维护和完善全球多边体系，推进多边经贸协定谈判将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受益。

本文作者徐秀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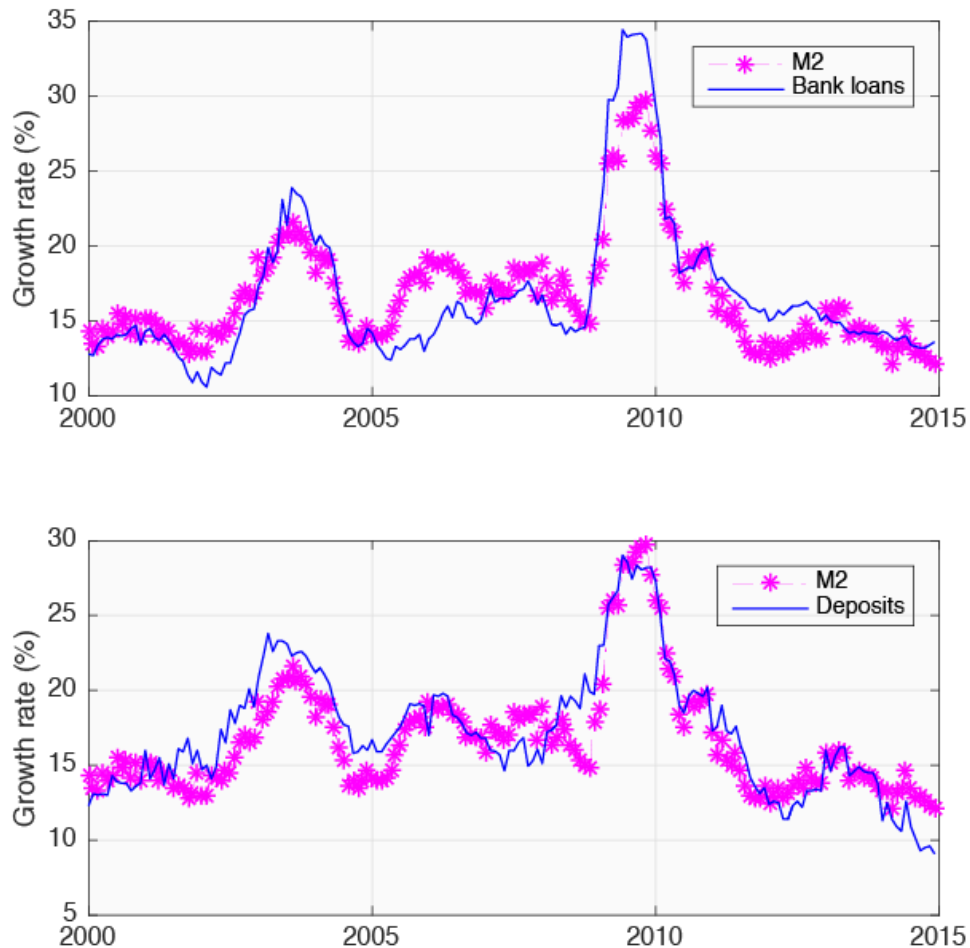
中国影子银行的前因后果

Kaiji Chen, Jue Ren 和 Tao Zha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影子银行在中国的兴起有助于稳定中国的产出增长。本文关注中国影子银行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委托贷款。在危机过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期，委托贷款获得了迅速发展，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部分的影子贷款通过非国有银行流入高风险行业。如果缺乏适当的管制，这样的金融扭曲将最终阻碍由投资导向型增长向平衡增长的转型。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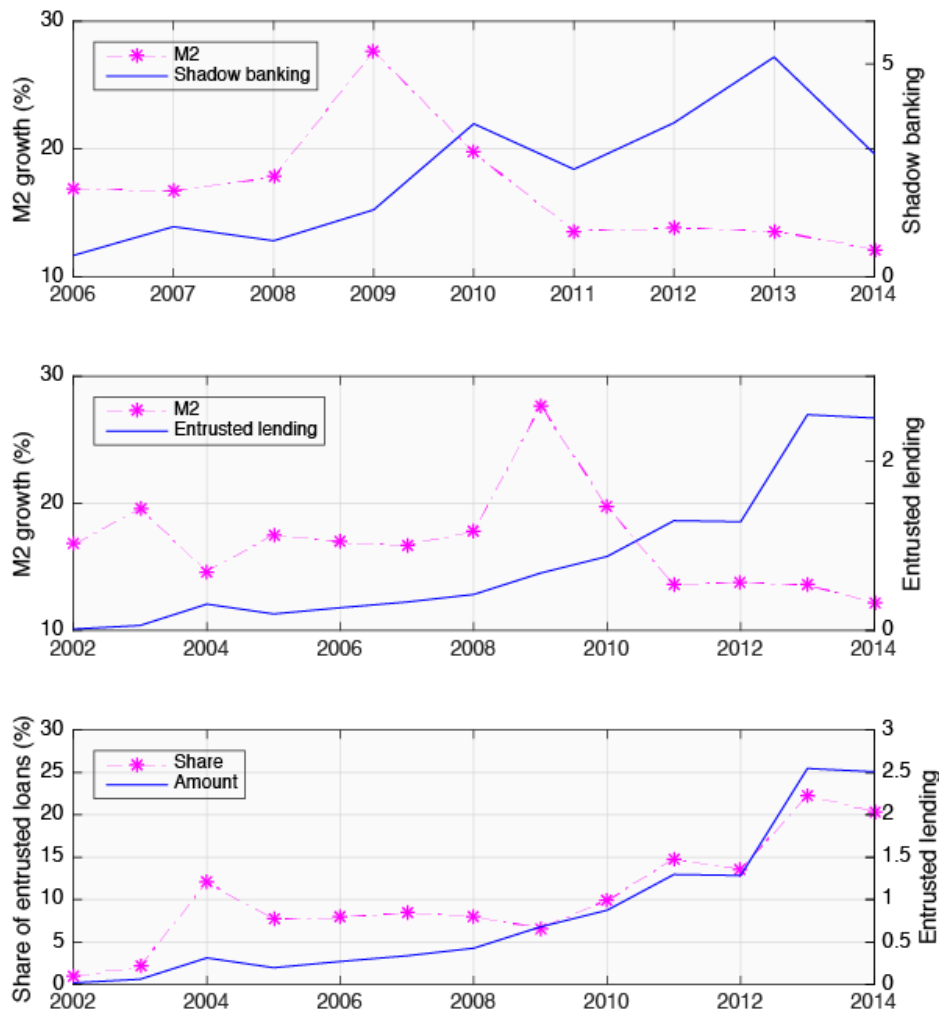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实行了大规模刺激政策之后，在 2010-2013 年间开始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由此导致银行贷款和存款减少，同时伴随着“影子银行”的快速增长。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银行贷款减少的影响，对稳定产出增长似乎起到积极作用（图 1 和图 2）。

图 1. 货币总量增长率（同比）、银行贷款和银行存款



来源：PBC（中国人民银行）和 CEIC（亚洲经济数据库）

图 2. M2 增长、影子银行增长和委托贷款增长（亿人民币）



注：委托贷款是影子银行主要组成部分。影子银行和委托贷款都是新增贷款。委托贷款比例指的是委托贷款占委托贷款和银行贷款总和的比例，其中银行贷款指的是新增银行贷款。

来源：PBC（中国人民银行）和 CEIC（亚洲经济数据库）

但问题是：中国影子贷款的增长对中国的银行系统甚至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在影子贷款中，银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中国的影子贷款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是中国影子银行的独特现象，因此成为本文分析的焦点。

委托贷款是非金融企业将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中间商），互相之间的借款行为。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两个非金融公司之间的借款

行为必须通过金融机构完成，其目的是鼓励金融机构通过专业的监测和筛查技术来帮助减少不良或高风险贷款，金融机构只能收取服务费用。

新增委托贷款在 2013 年达到最高峰，占影子银行总量的 49% 左右。从那时起委托贷款已经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的第二大融资来源。

从账面上看，这并不包括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似乎创建了一个不由银行提供的金融市场。因此，现有文献都集中于这种替代的融资渠道有何具体特征。Qian & Li(2013)提供了一个分析委托贷款方法，当借款企业和贷款企业有附属关系时（两家企业都属于同一集团）将委托贷款作为替代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Allen et al (2015)探讨了哪种类型的贷款企业倾向于使用委托贷款。He et al (2015)研究一个贷款交易的公告如何影响借款和贷款企业的股票价格。

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讨论委托贷款的增长对银行系统或实体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一重要问题已经开始在媒体上被谈及(如 Yap, 2015)。在我们最近的一篇论文(Chen et al, 2016)，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且规范的分析。

我们认为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银行在委托贷款的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我们首先整理了 2007-2013 年的微观交易数据，进行稳健性实证分析。我们的计算表明，M2 货币供应量增长每下降 1%，通过银行的委托贷款量增加 4.2%。反之，没有证据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非银行机构的委托贷款产生影响。在商业银行中，我们发现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的作用更大。特别是，M2 货币供应量增长每下降 1%，通过非国有银行的委托贷款量增加 5%，而国有银行只有 2.7%。

中国两个的监管政策和制度的不对称

在无数的银行监管政策中，我们确定了两个对非国有银行委托贷款起到积极作用的具体法规。

第一项法规是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颁布的低风险贷款(safe-loan)法律，旨在防止银行向高风险行业发放贷款。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房地产业和 18 个产能过剩行业（如钢铁、基础设施和石油行业）认定为高风险行业。在 2010 年紧缩性货币政策开始实施时，银监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限制银行对高风险行业放贷。

第二项法规是中国人民银行在 1994 年规定的银行贷存比不超过 75%。这项政策直到货币紧缩时期才开始实施。2009 年末，M2 增速开始减缓，银行更容易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引起的存取款风险的影响。国有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为了达到贷存比的要求，国有银行利用这一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大量吸收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存款。相比之下，非国有银行主要和小企业打交道，其存款客户缺乏广泛性和稳定性。因此，每逢存款监管时间临近，非国有银行就不得不以更高的融资成本增加存款，银监会将这一现象称为“冲时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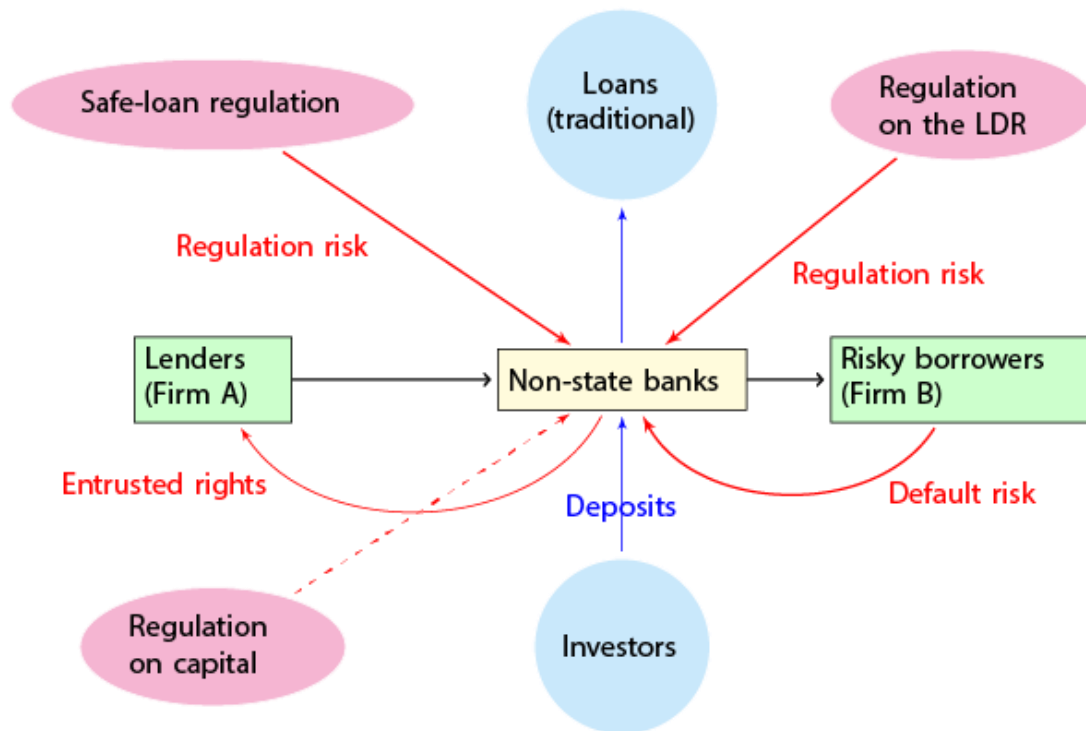
监管套利和银行的冒险行为

为了克服这些监管成本带来的不足，非国有银行试图寻找高风险投资，因为它们不会出现在贷款账项上。自 1997 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战略计划一直是推动重工业的发展。由于政府对重工业的隐性担保，发展重工业的计划一方面引发了投资热潮，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Chang et al. 2015 年)。非国有银行急于盈利来弥补监管成本，又深谙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愿意增加风险行业（大部分属于重工业）的贷款。

委托贷款可以完美的绕过以上两个法规，因为银行可以购买委托贷款的收益权（简称“委托收益权”）。与美国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类似，委托收益权使得银行可以成为高风险贷款的最终放款人。反过来，非国有银行将委托收益权放在应收账款投资项目中(ARI)。ARI 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属于资产而非贷款(Yap 2015)，因此不受这两个法规的限制。

非国有银行通过高风险委托贷款可以一石二鸟，即同时绕开了低风险贷款（safe-loan）的法律和 75% 的贷存比限制。由于委托收益权不属于银行放贷，非国有银行可以以此套利，在银行放贷监管风险和影子贷款的违约风险之间权衡，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制度特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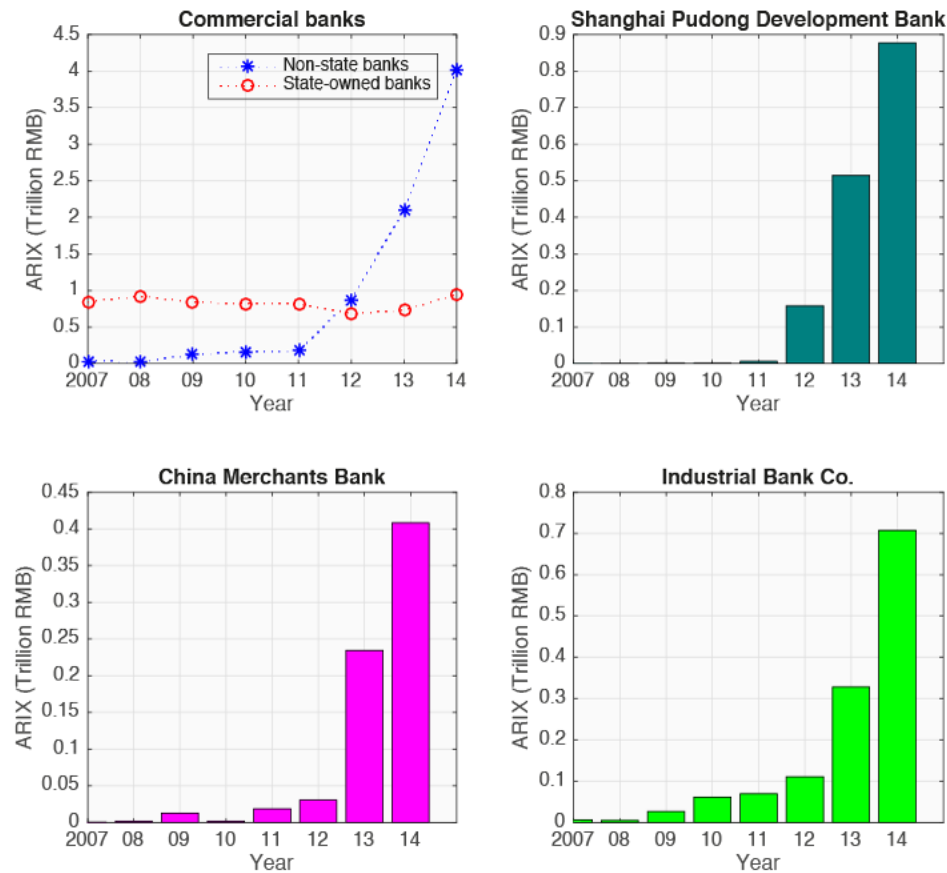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的委托贷款制度：非国有银行的委托贷款和相关风险



注：“委托收益权”指购买委托贷款收益权利的投资行为，这项投资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贷款中。“低风险贷款（Safe-loan）监管”是指2010-2013年间出台的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向高风险行业放贷的一系列法律。虚线表示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约束力还远远不够。

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前面的分析。通过我们的微观数据可知，2007-2013年间超过60%的委托贷款流向了高风险行业，在这些高风险行业委托贷款中，77%是由银行推动的。特别的，M2增长率每下降1%，非国有银行的高风险委托贷款增加7.6%。更重要的是，2010-2013年间，非国有银行推动的高风险委托贷款和应收账款投资ARIX（不包括中央银行票据）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反，国有银行的相关系数不显著。由于这种相关性，非国有银行的ARIX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期和委托贷款增长的同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国有银行的ARIX基本不变（图4）。

图 4 商业银行的 ARIX(亿人民币)



注：国有银行指的是四大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非国有银行包括 12 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其他地方商业银行，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等。“ARIX”是应收帐款投资，除去中央银行票据和中央政府债券。

来源：WIND，微观数据来自 Chen, Ren, and Zha (2016)。

展望

2010-2013 年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的影子贷款通过非国有银行流入高风险行业，这种制度上的套利使得风险无法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这一现象的源头是中国政府实行的以重工业促进投资，进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伴随着不断增加的企业和地方债，这种金融扭曲将最终阻碍由投资驱动向均衡增长的经济转型。

这一问题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2014 年以来，中国政府已有所行动，如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新法规来弥补本文提到的银行监管漏洞。其中几项新法规在阻止银行冒险发放委托贷款方面效果显著，无论是资产负债表内还是外，

都禁止银行为了弥补存款不足而提高存款价格，最终将延续数十年的贷存比政策一并撤除。

在这些新法规推出之际，了解影子银行的前因后果及其对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无疑将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构建一个稳健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供参考。

作者注：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一定代表美联储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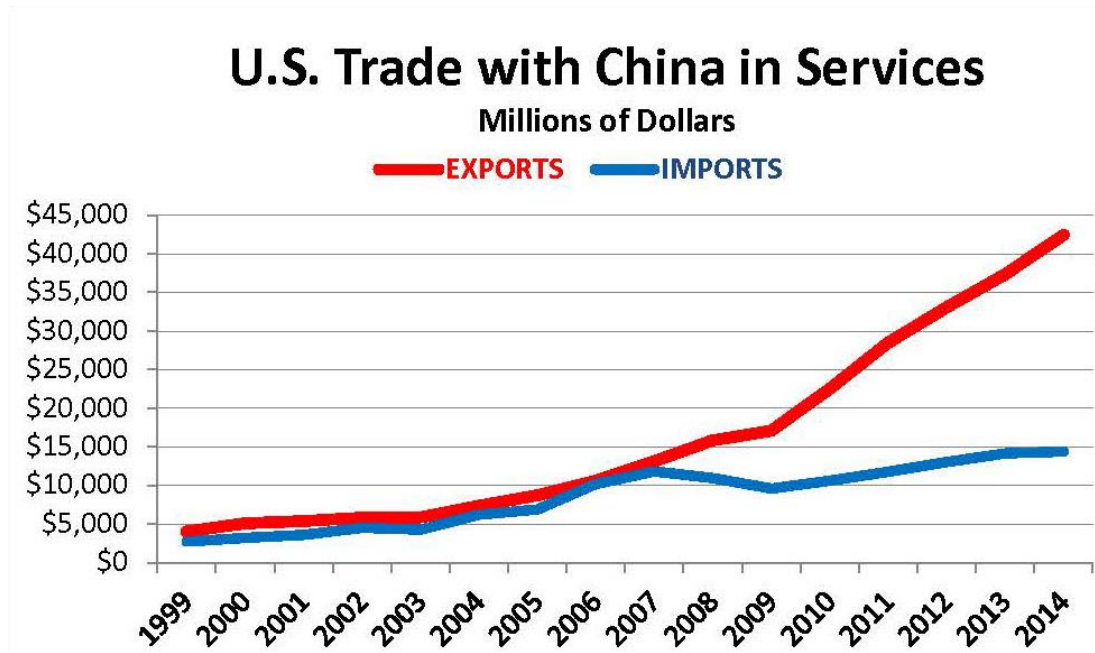
本文原题名为“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monetary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on banks’ risk-taking behaviour: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China’s shadow banking”。本文作者 Kaiji Chen 为埃默里大学经济学副教授，Jue Ren 埃默里大学经济学博士，Tao Zha 埃默里大学经济学，同时也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于 2016 年 3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美贸易不为人知的事实

Alan Reynolds /文 伊林甸甸/编译

导读：最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相关讨论甚嚣尘上。然而，这些保护主义言论是否站得住脚？主张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家又忽略了哪些问题？本文对一篇保护主义评论进行了批评。编译如下：

图 1 中美服务业贸易总量变化情况



William Galston 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为何针对贸易的批评声音获得追捧？》中问到，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从 2000 年的 1720 万人滑落到去年的 1230 万人。他提出，“美国失业人口高达 20% 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贸易入侵，而非墨西哥。”。然而，20% 这个数字的解释力很弱，况且这个数字是从 David Autor 等人的一篇工作论文的估计值的上限而来的。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如果 1999 年之后进口竞争程度再无提高，到 2011 年美国将多出最多 10% 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在这种假说中，“直接的进口竞争导致了 10% 的美国 1999-2011 年间的失业”。然而，作者也发现，自 2007 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进口扩张的速度又有了明显的放缓，并进一步影响了全球的贸易增长。

2007 年以来制造业失业率的上升，并非由进口导致，而是由严重的衰退和疲软的复苏进程导致的。事实上，在衰退时期进口是一定会下滑的。这篇论文的作者们强调，消费品（服装和家具，占到美国总进口的 47.7%）属于工业制成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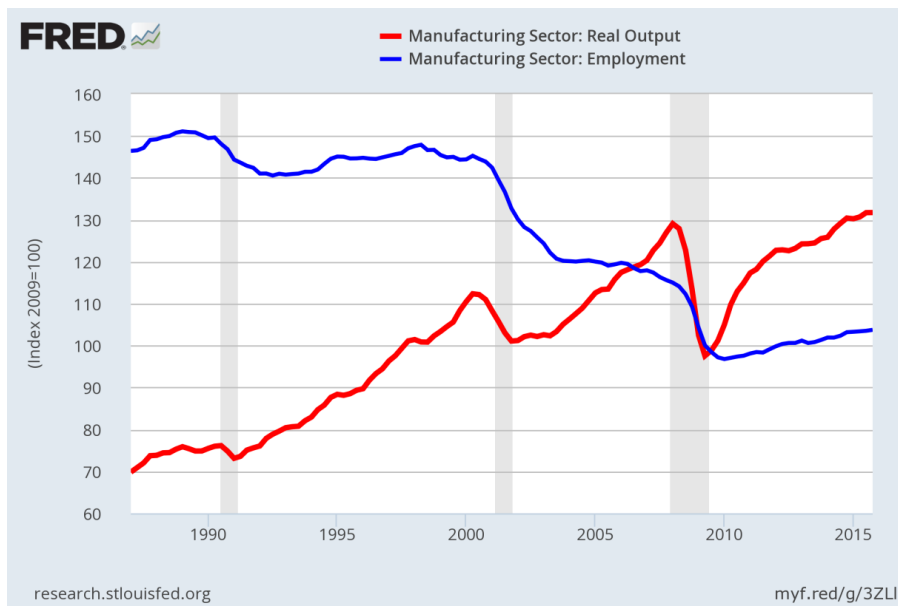
而资本货物才是扩大美国生产至关重要的投入要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美国工业陷入停滞时，其进口却增加了。

即便事实如 Galston 所言，07 年以来美国 20% 的制造业部门失业都是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造成的，那也不意味着美国总的就业人数下滑了。Galston 写到：“并没有证据表明，来自中国越来越多的进口导致了美国国内其他参与国际竞争行业就业人数的上升。”但正如论文作者所犯的错误一样，他们都将总的就业效应限制在了“货物贸易”上，而武断地排除了服务贸易，诸如财务和法律服务、会计、广告、旅游、电信和保险业。在美国的出口当中，服务贸易占到 32% 之多，而美国在这一领域也保持着对中国可观的贸易顺差。被外国公司以出口的方式赚走的美元，很大一部分都用于购买美国的服务，或者是用于投资美国的地产和金融资产，而这些行为无疑都会促进美国的就业。从这个角度看来，好莱坞、麦迪逊大道和华尔街都应该被视为巨型的美国出口商。

而将就业冲击限制在货物出口上的做法，也忽视了美国通过运输、批发和零售中国商品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如沃尔玛、亚马逊等），美国向中国及香港地区出口物资也是如此。顺便提一句，美国去年保持了对香港 305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这部分顺差也未被计入中美贸易顺差核算当中。

Galston 承认，“劳动产出的提升”也部分解释了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变迁。事实上，这一因素可以完全解释 1987-2007 年间的所有故事，在这一时间段内，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几乎翻倍。因此，大衰退和缓慢的复苏才能解释过去十年的失业增加，而不是国际贸易。

图 2 美国制造业产出与就业指数



本文原题为“Little-Known Facts About U.S. Trade With China”。本文作者 Alan Reynolds 为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3 月刊于卡托研究所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从“四个全面”理解中国经济信号

John Fei /文 张舜栋/编译

导读：习总书记上台以来，以“四个全面”为代表的政治口号也吸引了西方观察者的注意。如何理解这些口号的经济内涵？其中又包含有哪些政策推论？本文讨论了这些问题。编译如下：

近期以来一系列围绕中国经济的戏剧性事件，揭示了中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之处，也见证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由央行行长和证监会高层出面对熔断机制做出的照本宣科的表态。尽管已经有很多分析表示中国央行需要加强独立性并积极与市场交流信息，但还很少有人研究过近期事件与中共高层领导口号的关联。

中国奇怪的经济信号不仅仅是缺乏交流和监管结构过时的产物，也同时是政党领导方针出现深层矛盾的预兆。在中国这样一个党的理论方针是全国意识形态基石的国家，研究经济政策的有效方法之一是追溯到习总书记“四个全面”的口号上去。

何为“四个全面”？对于一般的西方观察者来说，这可能就像已故的大法官 Antonin Scalia 所描述的那样：“神秘的幸运饼干预言”。在浦东干部学院，中共设立于上海的党校，我和其他几位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一起研究了诸如“四个全面”之类口号的深刻内涵和政策推论。“四个全面”既是习总书记“中国梦”的一部分，也是其浓缩。四个全面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关，并且捕捉到了中国最本质的四大特征：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 全面深化改革；3) 全面依法治国；4) 全面从严治党。

第一个和第二个“全面”关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了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高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做法有助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而这也意味着资本市场自由化和放松汇率管制。考虑到去年八月央行贬值人民币的行动，似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显得更为重要。

至于第三个“全面”，我们遇到的中共官员普遍清晰地认识到，现有的司法体系亟需改革，从而能够促使现有的，依赖制造业和投资的不稳定的增长模型转型为创新经济。我们对话的官员当中，其中一些表现的非常直接，表示政府应当减少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并促使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与环境问题当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当然,无论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这两个目标似乎都与四中全会提出的第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相违背。针对党内严重的腐败问题,第四个“全面”的落实意味着在言语和行为上的诸多限制。与中共先前的口号“和谐社会”——强调社会稳定的学说——相结合,第四个全面也意味着支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管控。

举例说明,尽管有人提出构建法治国家需要与新闻自由同步,近期的政治宣传则要求媒体必须讲求“社会责任感”,而造谣造谣都属于此条要求的内容之内。这意味着报道中国股市的内幕或者外汇储备的消耗可能会被看做是“不负社会责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周小川几乎不在媒体露面,而党也继续加强了对经济新闻的管制。

无疑,关于人民币贬值和经济政策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重新考量北京高层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揭示中共将如何应对其理论内的深刻矛盾,例如四个全面及和谐社会理论。如果中共希望提升其针对国际经济问题表态的可信度,它们或许应该重新考虑四个全面和其他口号的内涵,从而确保更大的政策连续性。

本文原题为“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ic signals, start with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本文作者 John Fei 为麦克阿瑟基金会亚洲安全问题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3 月刊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

Christopher K.Johnson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的代表性战略规划。其在实施的过程，尤其是操作层面，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风险，但一旦成功，将会成为未来十年很重要的力量。编译如下：

在 2013 年秋，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被简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倡议是综合性的，有重点的。随着习近平政治权利的稳定，他开始努力加强巩固中国的外交。

如果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演变，就很难理解中国领导人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在很多方面，“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将采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带一路”不仅代表着中国新的增长模式，而且可以扩大中国的海外影响力，并和中国过去的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相协调。毋庸置疑，习近平主席把一带一路作为他任职期间的标志性的外交政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

尽管“一带一路”肯定有地缘政治的成分，但这部分被外国观察家过度夸大，尤其是美国的观察家。与实现中国的经济目标相比，“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色彩在北京眼中实在不值一提。“一带一路”号称可以帮助经济落后的地区发展经济，并吸收中国大量的过剩产能。同样的，“一带一路”的项目可以帮助负债累累的大型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新鲜的长期资本。最后，“一带一路”有助于大型国有企业成为全球有竞争力的企业。

尽管“一带一路”政策具有多重目标，但最重要的目标是强化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毋庸置疑，中国持续的经济下滑已经在考验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该意识到中国可以为了最重要的目标永久性地中断“一带一路”的项目。

当面对几个项目的重重困难时，习近平主席展示了钢铁般意志去克服。他的个人权威可以驾驭它的成功，可以说政治局一定会执行这个倡议。

但是，“一带一路”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分析家，学者甚至一些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该倡议太宽泛，太雄心勃勃，并没有为未预期到的困难做准备。例如，在操作层面，很难协调参与其中但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机构。另外，为项目融资的金融机构需要评估相应的信贷风险。建筑企业也需要评估当地的建设环境以及政治要求。不能适宜的评估外部风险也许意味着中央政府为这些项目做出的努

力要白费了。尤其是考虑到一带一路更多的是多重目标集合而非实践操作的蓝图。目前来看，这一战略还没有达成任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协议。外国政府也指出，尽管中国官员对实施“一带一路”有很高的热情，但北京并没有表示很高的合作热情。对于“一带一路”企业，另一个风险是这一战略的神圣性很有可能变为随着习近平主席的退休而沦为其政治遗产。

近期，一个问题是习近平对于“一带一路”的抱负是否会遭受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这将降低中国在区域贸易和投资中的吸引力），或者北京强硬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北京在亚洲积极的经济外交已经受到中国经济力量以及政策行动的束缚。即便中国奇迹般的增长提高了中国的吸引力，但它也引起了中国周边国家对其竞争力的忧虑。

尽管有很多困难和风险，但不能否认亚洲对高质量基础设施的需求有助于“一带一路”的成功。显然，华盛顿对此反应较慢：丝绸之路项目正在与亚投行倡议以及金砖开发银行形成复杂的联系结构，这会重塑欧洲的经济蓝图并对全球商业产生影响。如果习近平主席的倡议能够成功，这将会成为未来十年很重要的力量，2017年美国的新政府需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本文原题为“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本文作者 Christopher K.Johnson 是 CSIS 弗里德曼讲席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3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让中国赢，对美国有好处

Joshua Kurlantzick /文 张麟/编译

导读：2016年1月15日美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发表文章《让中国赢，对美国有好处》，作者对美国在亚投行成立后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分析与批评，呼吁白宫冷静对待中国的崛起，分清主次缓急。编译如下：

当中国官员在2013年宣布他们将建立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为太平洋周边地区的大型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他们发动了一场使华盛顿陷入错觉的慢动作外交。在中国人去全世界邀请各国政府加入的时候，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们给他们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友施压，使其不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总部在北京将会使中国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亚洲，白宫很焦躁。“我们对于那种不断迁就中国的倾向十分警觉”奥巴马的一个助手在英国加入并签署协议后向金融时报抱怨道。这是少见的一次对美国盟友的公开批评。

抵制中国的亚投行的运动并非个案。自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他的亚洲战略就是害怕、反对中国的几乎每一个举动，北京通过与他国的援助拨款、贸易协议、能源勘探，新外交倡议和军事关系来施展拳脚。这个反华战略可能是总统和共和党人之间达成共识的唯一之处。例如，唐纳德·特朗普说他不会放过每个打击中国的机会并且许诺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

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南海，中国的扩张权力构成了现实威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谨慎政策已经变为一个混乱的，偏执的，愚蠢的政策。这个政策认为中国人的任何新的行动都应停止，任何新的盟友都要被争取过来，任何新的野心都应被遏制。奥巴马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反制北京上以至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打击的一些中国人的行动并没有危及到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这些无用的斗争不仅疏远了盟国，还把美国的外交官、金钱和武器送到了与美国真正关切相距甚远的地方。在某些地区，美国要尽可能让中国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相对温和的机构，启动资本为约1000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由中国提供——是一个美国应该靠边站的地方。在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加入当创始成员国时，美国的官员有时说这个机构会复制老亚洲开发银行的模式。其他时候，他们说这个新银行会破坏援助项目的国际金融和环保标准。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如果到2020年亚洲较贫穷的国家想要保持全球竞争力需要大约8万亿美元升级基础设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意非常受这些国家和欧洲一些援助国的欢迎，而且并未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

奥巴马政府对那些所谓的威胁反应过度了，投入了过多的资源去改善与大陆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其中几个还是由非常不民主的政府所统治的。如果华盛顿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下降，战略失衡的后果是什么？像柬埔寨和缅甸这样的国家仍然与美国的投资人和战略利益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在 5 年前开始增进与缅甸的交往，但据官方统计自 2011 年来美国的投资者只对其投资了 200 万美元，主要是因为商业环境的恶劣。柬埔寨的情况也好不到那去。

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失败仅是使美国看上去虚弱无力，但其在东南亚非重要地区的争夺会造成实际的影响。华盛顿需要中国人的帮助去制止伊朗的核计划，气候变化和保护国际互联网安全。在关于南海的重要问题上与中国对峙是值得的，但在像柬埔寨这样的地方引起争端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类似的不必要的与中国的竞争还发生在非洲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中。这些地方对于美国公司和军事战略来说并非核心利益。中国人势力在这些地区的上升主要依靠多元的商业利益带动，并非预示着地缘政治竞争的新阶段的到来。

但奥巴马政府仍然把这视为一场争霸斗争。白宫的战略必然会分散美国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稀缺的外交资源，却使那些岛国感到被迫在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还是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中做出选择。而结果可能会使华盛顿尴尬：许多国家将因中国慷慨的援助和可能的投资选择中国。

尽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长，但其形象在许多地区，包括亚洲，仍然不牢靠。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很多邻国的关系都恶化了，主要因为其在沿海水域争端问题上的激进主张。根据调查发现在印度、菲律宾、日本和越南，有 74% 的人对中国评价为负面。相比之下，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从布什政府时期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根据 2014 年的测试，11 个亚太国家民众中近 80% 的受访者支持一个在经济和安全上更强大的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在美国减少军力、不再是唯一的世界经济超级大国之时需要警惕的中国带来的真正挑战有：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世界贸易量的一半经过此处），中国在东海行使主权将使北京拥有在东北亚这个地区阻截日本船只和战斗机的权利，中国加速海军的现代化以支持其权力要求。这些都是值得斗争的方面。

正确的策略要求我们精准的把握美国在什么地方应当对抗崛起的中国，在什么地方需要撤回一些权力。例如，在东南亚就意味着美国要帮助那些在南海敢于自卫的国家而减少对陆地国家的关注。

精细的战略操作也要求一个能让领导人讨论让予中国一些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环境。这将很难实现：任何使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下降的政治家将会成为政敌的靶子。但是承认以下两点不应成为政治上的烫手山芋，即中国正变得日益强大与更理性的外交政策是明智审慎的运用美国的资源。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资源用到真正对我们形成威胁的挑战上去。

本文原题为“Let China win. It’s good for America.”。本文作者为美国智库 CFR 东南亚问题专家 Joshua Kurlantzick。本文刊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在利比亚打击“伊斯兰国”所面临的三个挑战

Christopher S. Chivvis/文 胡霄汉/编译

导读：西方国家准备打击正在利比亚不断扩张势力的“伊斯兰国”。本文作者指出了“伊斯兰国”扩张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同时点明了西方国家对利比亚采取干涉行动面临的困难。编译如下：

在一月底同他的法国同行进行会晤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号召采取“坚决行动”来对抗“伊斯兰国”（ISIS）在利比亚日益增长的威胁。他的声明继数周关于如何处理“伊斯兰国”控制利比亚地中海沿岸大片地区的闭门会议之后发出，且西方军事干涉的传闻仍然没有被确定。

利比亚在五年前“阿拉伯之春”早期爆发的内战中分崩离析，北约迅速干涉，支持一个由民兵组织构成的联盟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但在这个胜利之后，利比亚的安全进程却踟蹰不前、无经验的国家正在摸索通往稳定的关键步骤。

利比亚陷入了内战，为“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组织——例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这个组织应当为2012年9月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遭袭一案负责——打开了大门。

“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扎根已经超过一年。不像其他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成员，利比亚的“伊斯兰国”成员数以千计并与该组织在叙利亚的领导层保持着明确的联系。“伊斯兰国”的领导层很可能将利比亚视为其全球战役的一个有价值的第二战场。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极大加剧了欧洲难民危机、并威胁了这一区域的稳定——尤其是突尼斯，这个“阿拉伯之春”起义的肇始地。

就如同全世界很晚才意识到“伊斯兰国”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带来的危险一样，“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形成的威胁也很晚才被意识到。它在苏尔特——卡扎菲的故乡——控制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桥头堡，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有势力。在十月份访问突尼斯期间，我听到的谣言说“伊斯兰国”已经在的黎波里郊外建立了军火工厂、为即将到来的反干涉斗争储备反坦克武器。

“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威胁了利比亚人民、整个地区乃至欧洲的安全。因此，那些最直接受到“伊斯兰国”扎根于利比亚的威胁的欧洲盟国——意大利和法国——引领了关于武力干涉选项的讨论。

但如果威胁是严重的，现在就要在许诺采取武力选项这个问题上慎重行事。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们至少要努力解决三个隐约可见的重大问题：

第一，谁将领导这次行动并提供大部分兵力？

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东欧的新行动中，在世界其他地方，北约的力量被分散了。意大利在正视“伊斯兰国”在利比亚造成的威胁这个问题上调门最高，并限制了它对其他行动的残余以便专注于利比亚。但单凭意大利自己不能为规模与如今利比亚局势相符的行动提供充足的军力。法国要更能干一些，但它的力量被分散在长达几千公里的萨赫勒地区的武装反恐行动上，并且还要集中部队执行国内反恐行动，因此也很难充当行动的主力。英国也许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尤其是在特种部队方面，但它能采用的手段与行动的意愿都是有限的。同时，美国公众对另一场干涉行动没什么兴趣。

第二，是要集中力量打败“伊斯兰国”还是要的黎波里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由于干涉行动兵力有限，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干涉行动首先要在“保卫利比亚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与“打击‘伊斯兰国’”这两个目标中做出选择。将目标锁定于打击恐怖集团将在短期内获得一些好消息，但这无助于将利比亚重建为一个正常国家，它还是会在第一时间向“伊斯兰国”打开大门。

第三，这一行动与美国及其盟友对抗“伊斯兰国”的战略有多大关联？

“伊斯兰国”的目标显然不仅局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庞大全球战役的一个部分，可能是这场战役中突出的一部分。要超出伊拉克和叙利亚、在全球作战，美国和它的盟友将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和资源。没有这些，在利比亚打败“伊斯兰国”只不过是令它迁移到这一区域的另外什么地方——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

欧美合作反击利比亚“伊斯兰国”是必要的，而利比亚没有外来军事力量的支持也不可能恢复和平。但抑制“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扩张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国家领袖们应当准备好支付不可避免的代价并做出艰难的抉择。

本文原题为“The Three Challenges of Countering ISIS in Libya”。本文作者国际安全与国防政策中心副主任、高级政治研究员 Christopher S. Chivvis。本文刊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兰德公司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维持在南海的吸引力

Phuong Nguyen/文 贺杨/编译

导读：蔡英文赢得台湾大选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过去八年稳定的两岸关系使得一度停滞的南海领土争端愈发激烈。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和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重点区域，面对当前的新情况，中国将会审慎的处理南海的领土争端，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但是中国对核心利益的追求不会改变。编译如下：

在最近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胜利。这一结果可能会使中国外交政策做出调整。观察家认为，过去八年稳定的两岸关系允许北京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就像一度停滞的南海争端，北京扩大了在南海的存在。

下一步，该区域内的各个国家将把北京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作为其战略重点和风险偏好的晴雨表。北京可能会对短期内的政策进行调整，但其核心利益不会改变。东南亚对习近平重塑周边外交，打造利益共同体以及实现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来说是关键要素。为此，今年晚些时候从中国西南地区到老挝首都万象的铁路将建成，这条铁路是昆明-曼谷铁路的一部分，可以延长到马来半岛，对中国来说这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点。2015年末，由中国公司组成的联营企业得到开发另一个北京计划已久的项目授权，这一项目是位于缅甸西部皎漂的深海港口和经济特区。皎漂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进入印度洋和切入中-缅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战略前哨。这些项目都是中国旨在通过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中国与东南亚日益增长的经济关系的战略组成部分，也为中国提供进入印度洋和泰国湾的通道。相对于其他参与者，中国在该区域的投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不受阻碍的程度，未来几年北京有望通过加倍努力，扩大在老挝、缅甸和泰国的影响力。但是如何管控当地尤其是缅甸的反华情绪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然而，南海是一个更大的问号。2016年初，中国政府就菲律宾向常设仲裁法院申述南海领土争端明确表态，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与此同时，马尼拉和华盛顿都寄希望中国会害怕自身国际声誉受到影响而接受国际仲裁，并迫使中国澄清九段线的划分。因此，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游说其他东盟国家在今年的区域会议上就国际仲裁问题保持中立。该区域人士担心中国会在各个地方仲裁后不久加紧在南海领土争端区域的活动。

许多观察家猜想，中国是否以及为什么会通过在南海采取自信的措施而损害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这将会导致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实力的崛起会影响到该区域的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最近中国国有企业收购马来西亚战略投资基金

1Malaysia Development Bhd 就是中国在区域经济中不可获取的例子。正在发生的事情指向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中国不能够改变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但是中国拥有的实力和意愿会影响到东南亚国家在中短期内对中国的政策。这也会给未来中国在该区域的发展带有一定的风险，最近几年中国都是在努力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并不想看到东盟的发展，也不会从美国主导的区域秩序中撤退，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国防部长会与东盟各国和美国的国防部长进行磋商和交流，以及中国推动和东南亚国家在澜沧江-湄公河的经济合作。

最近升级的美国-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加深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这会激起中国的好奇心。今年中国将继续积极的进入南海，伴随着不安全的态势，中国应该锻炼其协调能力。根本上来说南海的局势比较紧张，中国在该区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逐年增长。今年台湾选举的变化也促使北京明智的选择应对之策，但不要指望北京会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东南亚的战略目标上。

本文原题为“*For China, a Race to Retain Appeal in Southeast Asia*”。本文作者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部主席 *Phuong Nguyen*。本文刊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RAND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3名。

网址：<http://www.rand.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